

「母親」之外：從青少年懷孕服務 省思使用者主體性需求

商銘峻、陳俊賢

壹、前言

青少年懷孕服務中的當事人可能遭遇包括非預期懷孕事件初期的緊急因應、孕晚期的育兒預備到生產後的生活維持穩定等不同階段及議題，而筆者觀察，在如此多元且複雜的服務對象樣態中，表面展現的雖都是如「兒童照顧」、「生活安排」等行為層面之需求，然而這些服務對象核心的需求與焦點應包括其對於自身作為母親的自我認同想法。筆者於服務青少年母親的過程中，看見與聽見每位青少年母親在面對自我角色轉變與差異的生命故事，也反身思考自己身為提供福利服務的社工人員，福利服務的提供與青少年母親的需求是否有所呼應，又青少年母親是如何回饋這樣的福利服務？這一直是身處於實務現場的工作者，在面對福利輸送體系的運作中須持續省思的議題。

陳俊宏（2019）以角色理論（role

theory）中之「角色認知」（role perception）與「角色實踐」（role performance）概念思考青少年母親的母職（motherhood）樣貌，提及除了女性與生俱來的生殖功能外，社會體制、文化氛圍及當事人的心理發展歷程都將會影響個體如何看待自己作為母親的樣子，而這個看待的方式也將影響其如何實踐身為一名母親的任務；李育純（2006）指出青少年一旦懷孕後，在心理上最大的危機便是發展任務的中斷與受阻；曹宜蓁（2010）則提到青少年擔任親職，在身心、社會適應上需要更廣泛、更深入的資訊性、情緒性以及工具性支持，可知對於青少年母親（adolescent mothers）而言，其歷經的母職身分變化及自我認同歷程有其特殊性。

透過檢視相關青少年母親及其服務之相關文獻，並以筆者自身實務工作服務中與青少年母親對話的經驗，反思從青少年懷孕服務的歷程中，服務使用者的主體性

為何？又青少年母親在制度下面臨哪些困境？因此本文探討包括以下部分：

- 一、我國青少年懷孕服務方案之政策架構與資源輪廓。
- 二、以社工實務服務經驗探究青少年懷孕當事人對於母職角色之自我認同樣貌，藉以促進直接服務社工人員理解服務對象之主體性，並得以貼近服務對象之需求與生活狀態。

貳、既有政策及服務方案現況說明

一、國內法規

我國現有的青少年懷孕服務體系乃立基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第1項第11款：「對於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予以適當之安置、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托育補助及其他必要協助。」以及優生保健法對於婦女生育抉擇權益之保障精神，惟兩部法規所延伸之要點或準則，對於實際福利服務內容規範模糊，而衛生福利部（2021）函頒之《未滿20歲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方案（含未滿20歲少女懷孕服務流程）》雖架構起看似健全且稠密的服務框架，然細看其中服務內容多著重於如何排除非預期懷孕當事人所遭遇之立即性危機及需求，卻忽略掉以青少年為主體的非制度性需求，如青少年在生養育抉

擇、母職角色適應、家庭關係衝突協調等面向的議題，因此依循該架構所建構起的社會福利服務內涵是否能貼近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值得思考。

近年我國在社會安全網之建置亦將青少年母親納入可能存在風險之族群，依據衛生福利部（2018）核定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內容，「脆弱家庭定義」乃指「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所造成之物質、生理、心理或環境層面的脆弱性，進而需要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由此可知青少年母親可能因較為單薄之親職功能狀態致使其亦被納入脆弱之家庭類型之一，如此，也使得正式資源引入懷孕青少年生命之機會獲得提升。

然而，法規的規範下亦隱含對於未成年青少年母職能力的擔憂與質疑，筆者在青少年懷孕方案服務過程中便曾聽聞不只一位青少年母親對於自己在年滿20歲前必須持續接受社工人員的「關心」感到不耐，認為自己生活平順、也有充分的育兒知識，何以仍需不斷地接受社工人員的檢視，青少年母親甚至為了配合社工的訪視而須向學校或工作地點請假，如此以年齡進行服務對象範疇區分的方式著實使服務對象感到不被認同。

二、服務方案內涵現況

2009年起，至今我國未滿20歲未成年人之逐年生育率便落在千分之四，若換算為生育數，每年皆有至少逾2000名青少年發生懷孕事實，其中還不包含終止懷孕者或其他無法被統計調查到的黑數，而我國內政部兒童局（衛生福利部前身）於2006年設置之「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專線」及「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可視為對於此族群發起全面性關注的象徵，此二平臺除提供立即性之線上諮詢服務外，亦提供非預期懷孕相關資源資訊分享以及民間單位轉介服務，可視為接觸到懷孕青少年之前線之一。

現今我國青少年懷孕服務輸送方式主要可區分為「專線諮詢」（為全國性質、含網站留言）與「社區服務」兩種類型，社區服務對象來源則包括「自行求助」、「機構內方案轉介」與「政府轉介」幾種，目前案源仍以「政府轉介」為大宗，若服務家庭狀況風險程度較高、需求複雜，則合作網絡可能包含家防中心抑或是社會局脆弱家庭方案一同承接因應，如此公私部門的協力構成我國青少年懷孕服務之資源輸送網絡。

至於資源輸送內容除透過附件中描繪之資源類型外，亦可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諮詢承接青少年懷孕服務之民間福利機構工作者而彙編之未成年

懷孕服務資源手冊，主要預設之閱讀者包括兒童及少年、社會大眾以及第一線專業人員，詳讀後可知冊中仍然主要提供關於「經濟」、「托育」、「就學／就業」、「收出養」等關於生活層次之資訊，期待供閱讀者一明確直接的問題解決途徑，惟手冊中雖另有刊載調性較為柔軟、富有情感之故事體文章，但故事之主題多針對當事人在知悉懷孕時的不知所措、對於出養抉擇的割捨等負向情緒進行書寫描述以及預防方法的串聯，對於懷孕青少年之「母職認同與實踐」與「家庭關係協談」、「生涯規劃」等需求面向則未有描寫，由此亦可見我國服務策略制定者對於懷孕青少年之想像仍停留在經濟脆弱、育兒經驗與能力不足等層面，對於一具有主體性之生命，在經歷非預期懷孕事件後對於自我認同、家庭關係、生涯規劃的衝擊等需求與變動皆難以被現有福利服務回應與承接。

參、青少年的母職實踐與困境

一、「青少年」與「母親」的雙重角色

「我覺得我可以把孩子照顧得很好，但周遭的大人好像總不認為我是一個好媽媽……」，這是在服務青少年懷孕服務中，社工經常會聽到青少年所提出來的感嘆，當社會對於青少年在該時期應有穩定就學、求職的社會期待下，社會卻忽

略了一群踏入母職經驗的青少年母親，而青少年母親們也缺少了足夠的社會支持與環境，讓自己準備做好「青少女」與「母親」的雙重角色。同時，青少女母親有其在生理/心理以及社會處境中之特殊性，對於個體而言其將同時處於「自我探索」與「照顧他者」之略有衝突的角色任務夾縫中，而在角色認同意識上的移動便將形塑出其對於行動發展方向與任務因應的選擇。依據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青少年時期的個體正面對自我認同的發展任務，個體透過與社會各層次系統的互動來探索、面對自身的發展危機，並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成長（引自郭靜晃，2008）。

然而隨母職角色的「降臨」，青少女可能出現對自身發展的關注焦點移往胎兒/新生兒的表現與需要，「照顧責任」成為其當前更加重要且具有立即性的任務。筆者在實務工作中便曾經驗多位因非預期懷孕事件而被迫中斷學業的女孩，無法依循自身所願成長的他們卻也並未因此而怨天尤人，反之更多的是思考在有孩子的情況下可以怎麼同時兼顧自己與孩子的生活、尋找不同的生命出路。

實務現場發現這些任務的發展次序與進程許多時候是由個體所擁有的內外在資源程度而決定，往往擁有較豐富經濟資源、受家人支持程度高者可以以更穩定的狀態因應母職的角色工作，同時也可能獲

得更多於學校、人際等網絡面向中維持互動關係的空間；反之，與家人關係隔絕、經濟能力薄弱的當事人，將必須花費更多精力及時間成本於胎兒的照顧以及收入的賺取，進而也對於其自身生命關注的焦點限縮於孩子的成長、生涯的選擇與自我實現成就之想像逐漸窄化，但這並非表示陷於此處境的青少女母親具備更低程度的母職自我認同感，僅能解讀為其生活資源與選擇更加匱乏。如一名筆者曾經服務過的青少女，因著他們低收入戶與隔代教養的家庭經濟背景，在養育抉擇的決定上，百般不得已地選擇將孩子出養，因著支持系統的有限而留下的懊惱與不甘的眼淚至今仍讓人心疼。

呼應陳俊宏（2019）在探究青少女母親母職歷程之質性研究中特別以角色理論（role theory）中之「角色認知」（role perception）與「角色實踐」（role performance）概念聚焦於青少女母親因角色認知之感受理解而在行動選擇上有所差異之表現，如此的變化及移動便會形成一路徑，亦即從「知道自己成為母親」開始走往「我必須做一些母親會做的事情」，在該研究結果中可見這些所謂事情所指涉之行動包含青少女母親對於嬰幼兒之照顧、對於自身生涯安排之規劃、對於自我效能之信心程度等，由此可知青少女母親如何看待自己將會對其實際的生活品質與行動選擇造成影響。而社工於既有服

務制度的危機性處遇中，亦須著力更多在陪伴青少年母親認識與練習當一位「好母親」，從角色培力的方向出發來提升青少年母職的能力，這群青少年母親不應被視為是社會上的問題或風險，在服務的過程中更看見許多青少年母親也努力在有限的資源與能力下，積極地朝著母親的角色努力。

二、影響個體母職角色認同之因素

經以上描述及理解個體行為選擇與自我認同之關聯性後，對於青少年母親之母職角色認同如何受到影響將是必須被關注之方向。羅家玲（2012）將自我轉化（translation of self）的概念及歷程放入青少年母親之角色認同成長過程中，其認為有關自我認同部分之關鍵在於社會互動會影響個人看待自己的觀點，同時也影響個人賦予其所經歷事件之意義、以及個人與外在環境世界互動或連結的形式，而自我認同的轉化將為一個人與環境之間動態性、脈絡性與意義性的相互建構歷程；換言之個體可能因著社會環境、家庭關係或自身內在心理情緒等各層次之資源影響自我認同之因素而在母職角色實踐上有所進程與移動。

陳俊宏（2019）在其研究中亦透過文獻整理區分出三個較為廣泛可見影響母職角色認同與實踐之因素，分別為「性別角色社會化」、「重要他人支持系統」以

及「青少年母親個人支持系統」，可知從傳統父權主義所建構出之華人社會文化便開始對於不同性別角色所應擔負的角色任務差異進行框限，這樣的影響亦蔓延入各個層次之系統中，影響系統對待個體之觀點，也影響個體看待自身的觀點，而重要他人支持系統之資源豐富程度對於青少年懷孕母親在母職角色實踐上的作用關乎於個體如何突破困境，其中包含家庭成員對於懷孕事件的態度觀感可能影響當事人的抉擇，如養育、就學等生涯分配。而經濟支持的提供將影響當事人的生活安排，包含育兒資源的使用與否、就業的必須性等。另亦包含學校制度如何對待懷孕青少年在就學與角色權衡的輔導協助等，都是重要他人支持系統所可能對於個體母職實踐的影響因子。

綜合上述，可知青少年母親在母職角色之感知與自我認同除了來自外在環境與內在觀點、知能等因素外，亦與內外在資源之間互動的歷程經驗有所關連，而社工員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便形成連結兩造的潤滑與催化劑。

肆、發展以懷孕青少年為主體的福利資源輸送策略

經由上述文獻研究與整理分析，可知社會福利資源可能透過不同面向、層次與形式進行輸送與供給，而其扮演之角色便

在於提升及促進個人與家庭之功能，最終目的便在於預防個體遭遇問題抑或是落於危機之中。因此，本文所指稱之社會福利資源內涵即為對於個體提供正向協助之政策措施，然而檢視許多文獻以及政策內涵卻能發現，現有社會福利資源之輸送內涵與策略仍是站在將懷孕青少年視為風險與潛在危機族群（牛憶先，2000；曹宜蓁，2010；吳淑玲、陳國彥，2016）的立足點，進而也以此角度進行服務的發想與資源媒合，其中鮮少考量青少年母親角色認同與生涯發展需求及生活樣態特殊性來調整服務方法與資源樣貌。

如汪淑娟（2012）所述，懷孕青少年應被視為中性之社會現象及事實，而社會及體制之資源應盡全力因應當事人的內外需求及生命價值與任務發展困境，針對非預期懷孕事件的成因則應有更多更為深層之了解與追蹤。同時，應避免過度簡化與汙名青少年母親之養育抉擇與母職表現，對於非預期懷孕事件的預防以及青少年母親的生命品質提升將是可以透過資源豐富程度以及資源輸送管道之拓展而並行之策略方向。

筆者曾經陪伴一名17歲的青少年母親辦理復學程序，在孩子將滿2歲時，為了重回校園完成高職學歷，奔波於不同間學校中詢問夜間部是否有科系尚有剩餘名額，只為了找到符合自身志向且便於自己接送孩子的選擇，然而現實層面是她必須

與其他應屆的學生競爭有限的科系名額，同時校方對於年輕的她做為一名母親為了照顧孩子而無法準時到校上課一事也存在有限度的耐心，制度上缺乏彈性與體諒的結果下，這名年輕的青少年母親最終仍僅能辦理休學，無法如其所願地取得高職畢業的身分，像這樣的故事在實務場域中一再上演，亦讓筆者不禁感嘆青少年母親在我國社會生存的不易。

綜上所述，如以同時作為青少年以及母親雙重角色的服務對象，公、私部門於福利樣貌的多元設計下，應給予合適之就學與托育環境、協助排除當事人在母職實踐過程中之困境，於校園輔導機制方面則可就催化自我認同觀點角度連結不同專業背景之師資人員成立陪伴小組，對於仍在就學中之當事人提供較為接納而具備省思催化效果之互動對象，同時對於當事人之家庭進行溝通與角色位置移動之提醒，藉以引導當事人於角色認知中有更為明確的定位與對於該定位所可能造成影響之理解，同時亦可鬆動對當事人角色實踐困境之阻礙。

另就實務服務端的社會工作角色，應在專業教育或在職訓練等環節中提升於直接服務中對於服務對象自我認同議題之關注與催化技術，而非過度集中於問題解決、企求以效率主義之處遇邏輯立即性地化解服務對象龐雜而富有結構議題之困境，使得進入到福利體系中受助之個體

得以被視為具有生命發展需求與複雜性的「人」，而非一扁平、僅會為社會帶來問題與麻煩且難以完整承擔任何角色任務的「弱勢」。

伍、結語

檢視現行的青少年懷孕服務制度，可以理解政策制定的目的乃期待透過社會福利資源的投入降低懷孕青少年及其子女的生命發生危機與傷害，甚至想透過性教育的宣導與避孕資源的提供來降低青少年們再次懷孕的「風險」，然而實務工作的現場仍存在現有資源對於懷孕青少年需求想像的偏離。本文以青少年個體對於自我認同之概念所可能對於生活表現造成之影響作為基礎，藉由筆者實務場域服務青少年母親的經驗，從中聚焦於青少年母親對於「母職」之角色認知與實踐，可以發現對於青少年母親而言，其看待自己的自我認同觀點，亦即是否將自己視作一名母親，不僅明顯對於其育兒能力的學習與展現、就學/就業之動力、生涯規劃與實踐等等層面發揮作用，個體也更進一步對自身的生命品質與自我效能及角色信心產生漣漪與連結，可知催化青少年母親自我認同觀點之目的不僅在於促進其成為一名更好的母親，更關注是否得以使其成為一名更「如己所願」的人。

關於懷孕青少年在角色認知層次轉化

及行動之關聯性，透過檢視我國對於青少年母親之社會福利資源輸送制度，可見在內容龐大、範圍廣闊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中，關於懷孕青少年之關注及照顧量能相當有限，就該法所延伸之服務流程框架中則可以發現資源樣貌與福利設計邏輯多是針對青少年母親在遭遇非預期懷孕事件當下與產後所可能面臨之明顯可見、可觸及之生活困境（如：經濟貧乏、養育知能不足等）提供短期而立即性的資源挹注，對於該群體之自我認同觀點進展歷程關注甚少，亦未有相應的資源設計。

換言之，或可將此現況解讀為在福利制度立場上，青少年母親被視為一個需要解決的風險問題多過於被視為一個具有自我認同斷裂困境的青少年與母職共同生命體，以實務現場的服務策略，社會工作者之核心任務不僅在於維持服務使用者的安全、更需要使其擁有受自己所認同的生命樣貌與角色位置，而非從外界主流的眼光與框架中看待自己。另外，當青少年母親看待自身的觀點有所轉變時，其行為模式與選擇也都會出現調整，如此便也將貼近原先政策設計所想達成的目的。據此，如何透過建制的鬆動與調整、使我國針對懷孕青少年所挹注的資源內容得以從殘補式的救急補充轉向支持性的角色認同與自我接納，將是值得持續思考與努力的方向。

（本文作者：商銘峻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社會工作師；陳俊賢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社會工作師）

關鍵詞：青少年懷孕、服務使用者觀點、主體性需求

參考文獻

- 牛憶先（2000）。《影響未成年懷孕母親生育後復學之家庭，經濟與社會規範因素》（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f5p9sd>
- 吳淑玲、陳國彥（2016）。〈青少年懷孕問題及生育決定之探討〉。《人文社會電子學報》，12（1），1-17。
- 李育純（2006）。〈論青少年未婚懷孕及其影響〉。《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57。<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57/57-73.htm>
- 汪淑娟（2012）。〈青少年生育，有什麼問題？〉。《台灣醫學人文期刊》，13，141-156。
- 曹宜蓁（2010）。《青少年伴侶經歷未成年生育事件歷程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yfwm2f>
- 郭靜晃（2008）。《兒童少年與家庭社會工作》。揚智。
- 陳俊宏（2019）。《非預期懷孕青少年母職角色實踐之研究》（碩士論文，靜宜大學）。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y4ds4r>
- 衛生福利部（2018）。《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本（107-109年）》。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8）。《未成年懷孕服務資源手冊》。衛生福利部。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1，9月9日）。〈未滿20歲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方案〉。<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Detail.aspx?nodeid=1209&pid=9550>
- 羅家玲（2012）。〈我是母親？！少女母親的母職經驗與自我轉化之研究〉，《南台人文社會學報》，7，1-23。